

【专题论文】

“做中学”：在斯坦福大学教文图学

**Learning by Doing: Experience of Teaching Text and Image Studies
Course at Stanford University**

衣若芬*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I Lo-fen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ingapore

E-mail: ilofen@ntu.edu.sg

Published online: 19 December 2020

To cite this article (APA): Lo-fen, I. (2020). “做中学”：在斯坦福大学教文图学. *ERUDITE: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and Education*, 1(2), 77-88.
<https://doi.org/10.37134/erudite.vol1.2.3.2020>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37134/erudite.vol1.2.3.2020>

摘要

“做中学”(Learning by doing)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主张的教育理念,对二十世纪的教育方式具有深远的影响。笔者秉持“做中学”的方式贯彻于教学,效果显著。本文分享笔者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文图学”的经验。“文图学”研究图像文本的观看之道,是笔者近年开发的学术方向。本文举了三个教学实例,采取“做中学”的方式,配合课程设计,学生能够自然理解汉字的造字原则、中国绘画图卷的叙事结构,以及细察书画笔法。

关键词: 做中学、文图学、斯坦福大学、汉字、书法、绘画

* 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Abstract

‘Learning by doing,’ a pedagogical theory developed by American pragmatist John Dewey (1859-1952), has sent reverberations through educational systems in the 20th century. As a teacher, sticking to the ‘Learning by doing’ principle has proved to be highly productive in my educational practices. This paper puts emphasis on my experience of teaching ‘Text and Image Studies’ course at Stanford University. Such a research approach is currently theorised by myself, aiming at exploring the visual perception of texts and images. With detailed course plans, this paper provides three specific teaching cases applying the ‘Learning by doing’ method to help students effortlessly understand the structural rules of Chinese characters, the narrative forms of scroll paintings, brush strokes in Chinese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Keywords: Learning by doing, Text and Image Studies, Stanford University, Chinese characters, Calligraphy, Paintings

一、前言

“做中学” (Learning by doing) 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 (John Dewey, 1859-1952) 主张的教育理念, 对二十世纪的教育方式具有深远的影响。笔者秉持“做中学”的方式贯彻于教学, 效果显著。

2018 年春天, 笔者有幸受美国斯坦福大学 (Stanford University, 或译史丹佛) 邀请, 和 Ronald Egan 教授合开“文图学” (Text and Image Studies) 课程。“文图学”是我 2014 年提出的研究思路, 在我任教的南洋理工大学开设相关课程, 并于马来西亚、香港、台湾、韩国、日本、中国大陆等地的多所大学和文博机构演讲。2017 年筹办召开文图学与东亚文化交流的国际学术论坛¹, 同年新加坡政府核准成立我发起的“文图学会” (Text and Image Studies Society), 我担任荣誉主席。²



图 1 作者在亚洲演讲文图学的地理分布

¹ 会议论文后结集出版, 衣若芬主编, 《东张西望: 文图学与亚洲视界》(新加坡: 八方文化创作室, 2019)。

² 文图学会网址 <http://tiss.info/>

因此，去斯坦福大学之前，我已经有了教学演讲的经验和多篇论文发表，除了用英语授课，对我更大的挑战，是采用怎样的教学方式，才能有效传达“文图学”的意义与价值。我实践了“做中学”(Learning by doing)的教育理念，得到了学生全面的认可和极高的评价。本文先介绍文图学的概念，继而分享在课堂“做中学”的过程和例子，希望提供教师同行斟酌参考。

二、什么是“文图学”？

文图学研究文本(text)和图像(image)，是融会文学、美术、历史、文献学、图像学、社会学、心理学、符号学³等等学科的一种学术视角和诠释思路。⁴

提出“文图学”，主要基于笔者长期从事跨学科的研究，发现学科之间固然可以横跨，相互吸取借用方法和观点，毕竟有某种“暂时合作”之感。再者，随着学术视野的去边缘化，所谓的“跨界”，不如“融会联结”。文化艺术生产形式的多样化，一些不属于原本概念里的“文学”和“美术”创制，比如商业广告、影视节目等等，都需要有新的语汇和方法带动研究发展。文图学的研究，既能提供做为“使用者”的欣赏愉悦、评价判断；还能梳理出原则模式，让“设计者”有所依循，促进“产品”的升级和迭代，可说既响应解决了学术的需求，也协助创制开发。

过去我们谈“文本”，偏重于文字或文学，有时也称“作品”；文图学谈的“文本”，着重的是“被赋予意义”的开放状态，是动态，而且可能因时、因地、因人变异。文图学的“图”，强调的是视觉性，指文本经由感官或想象被看见、被意识。

文本用以表达、沟通和记录，依其生发的途径，可概括为三种类型。

1. 肢体：文本身体(textual body)

姿态、眼神、表情、手势、动作、服装仪容、舞蹈等等。

2. 声音：声音/语言文本 (sound/voice/language text)

³ Sean Hall, *This Means This, This Means That: A User's Guide to Semiotics* (London: Laurence King Publishing, Ltd., 2007). 尚恩·霍尔著、吕奕欣译：《这就是符号学！探索日常用品、图像、文本，76个人人都能读懂的符号学概念》（台北：积木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15）。

⁴ 衣若芬，〈文图学：学术升级新视界〉，《当代文坛》2018年第4期，页118-124。

无意或刻意发出的声音, 比如兴奋时欢呼呐喊; 跌倒时惊慌唉叫; 婴儿的啼哭; 战士的怒吼……乃至音乐歌唱和语言。

3. 图绘: 文字/文学文本 (word /literary text)和图像文本(image text)

文字尚未被发明之前, 人类便懂得绘画和创造符号。结绳记事、甲骨占卜、拼音文字或是像汉字一样的语素文字(logogram), 都是线条构成的符号, 呈现为图串或图块。文字被有意识地排列组合为句子, 联织句子为篇章, 即近乎文学。

图像文本依其形态, 也可概括为三种类型。

1.图: 所有具可视性(visible)的视觉形式, 例如符号、图标、商标、绘画、图画、图案、图形、标志、照相、摄影、影像、线条、地图、色彩、印刷物等视觉语言。

2.形象、印象: 审美主体对客体的整体观察、归纳、总结、凝炼而成的认知和观念、评价。

3.想象、意象: 抽象的心灵图景。具有互文关系的各阶段文本累进迭加所展现的审美结果。

“文图学”不称“图文学”。文图学强调的是文本的开放性、多元性和歧义性, 图像是文本的外观, 由于“文学”一词在中文语境里已经有专指, 所以叫“文图学”比“图文学”明确。

文图学的文本概念包括肢体、声音、图绘/书写, 这些都是人类的行为, 源于《诗大序》说的“情动于中”。“情”之所生, 乃《文心雕龙》所谓的“应物斯感”, 文学艺术创作即为“感物吟志”的结果。“物”可以指所有人为和天然的对象/物象。

以山水为例, 南朝刘宋画家宗炳(375-443)《画山水序》说: “圣人含道暎物, 贤者澄怀味像。至于山水, 质有而趣灵。”山水天然的形质是圣人贤者观想的对象, 山水的灵性与趣味, 有赖于体察品味。换言之, 山水是需要被诠释、被赋予意义的文本, 这就扩大了文图学预设的文本指涉, 朝向容纳肢体、声音、图绘/书写的空间发展。

世界的运转需要动能, 存在于世界的对象/物象都是“文本”, 人既是文

本，也生活于文本中。个人的肢体、声音、图绘/书写文本会与他人产生的文本形成互动，如果是艺文创作，我们会说那互动的力量互为文本，简称“互文性” (intertextuality)。

肢体、声音、图绘——“文本”的生发彼此迭加、会合的组建关系，显示了文图学研究的广阔范围，可从史前考古到当代制造。文字书写构成语词和文句，艺术化的语词和文句组织为文学。声音旋律表现如音乐。舞蹈是文本身体与音乐/节奏的结合。书法的内容是有意义的文字，外在则展现如图像的笔墨线条。结合文字、音乐和图像的情形更多，动画、影视、互联网，乃至我们日常使用的手机信息，都值得我们探究。⁵

三、让自由之风吹拂

能够在斯坦福大学顺利开设课程，归功于该校的弹性学习制度和丰富的教学资源。

位于加洲的斯坦福大学，在一片被称做 Farm 的地方，这里本来是 Leland Stanford(1824–1893)家的马场，大约 33.1 平方公里，相当于澳门的土地面积，可能是全美国最大的单一大学校园。为了纪念旅游欧洲时不幸得伤寒症，15 岁就病逝的独生子，时任加州州长的铁路大亨 Leland Stanford 于 1891 年以儿子的名字创办了 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希望和儿子同样年龄的青年男女都能够有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早期斯坦福大学免学费)。

如同斯坦福大学的德语校训 *Die Luft der Freiheit weht*——“让自由之风吹拂”，自由的氛围无所不在。浅黄色的石砖墙，红色屋顶，仿古典希腊的拱门、回廊和长柱，鲜明的 Mission Revival Style(使命复兴样式) 建筑。蓝天无云，金光闪耀，看见青年男女溜着滑板穿梭；或是半赤裸地躺在喷水池边、大草坪上晒太阳，如果你不走进大楼里，真会以为来到了花团锦簇的大公园。

高昂的学费和房价⁶，繁重的课业压力，“自由”伴随的是“自律”和“自知”。一年分为四个学期，以我任教的东亚系为例，本科生的毕业要求是 180 个学分；硕士研究生 46 个学分；博士研究生 135 个学分。大量的学分要求，

⁵ 衣若芬，《春光秋波：看见文图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衣若芬，《南洋风华：艺文·广告·跨界新加坡》(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16)。

⁶ 衣若芬，〈胡佛塔上〉，新加坡《联合早报》，2018 年 6 月 2 日。

相应地显示大学提供课程的力度，自然形成弹性、自由、多元的课程设计。有的课程可以让学生自行决定所选的课“值”多少学分，弹性差距将近 1 到 3 学分。专业学术之外，还有品酒、冥想、编舞等等活泼有趣的课；如果能抢修到高尔夫球课，学生们都很兴奋，那是在校友 Tiger Woods 打球过的标准 18 个洞球场呢！

前沿的思想和话题都能开课讨论，重在启发创新的思维。一个学生和我聊天时，谈到他修的课有两位主讲者，每次上课都彷彿辩论大赛，不但主讲者从对立的观点陈述见解，同学们聆听之后，纷纷参与讨论，提出各种看法。这样高强度的“头脑风暴”，密集的批判性思维训练，真是刺激又过瘾！

斯坦福大学和高科技、创投公司云集的硅谷(Silicon Valley)有地缘和学缘关系，可能被视为“理工挂帅”的大学。看看校内各大图书馆的典藏，以及丰富的网络资源人文数据库，即使学习人文学科的学生人数远少于其他理工科系，我接触的学生都告诉我，没有感觉大学的资源分配不均。我也想起去美国之前，担心课程需要的文学及美术史书籍不够，准备扫描资料做为教材，上网查询，才发现，我的担心完全多余。这促使我妥善运用大学的资源，落实我“做中学”的构想。

四、“做中学”和文图学的原理

“做中学”有别于教师在课堂唱独角戏，单向灌输知识，而强调学生的参与，经由亲自动手操作以应证理论或发现新知。

我常说：“文图学就是认识世界。”我们的五感之中，从视觉得到的数据量高于听觉、味觉等等，大脑处理视觉的神经元特别活跃，理解视觉，便能帮助我们感知世界的大部分样态。从“认识世界”以臻智能人生，借用知识管理的金字塔模型(knowledge management cognitive pyramid, 又称 DIKW Hierarchy)⁷，对应到文图学的概念，如下图：

⁷ 知识管理的金字塔模型建构由数据(data)、信息(information)、知识(knowledge)，上升到智慧(wisdom)的体系，在 1980 年代提出，代表人物有 Harlan Cleveland(1918-2008)、段义孚(Yi-Fu Tuan, 1930-), Daniel Bell(1919-2011)等学者。包括教育、科技、经济等学科都使用这个模型，並加以批评或改良。参看 Jay H. Bernstein, “The Data-Information-Knowledge-Wisdom Hierarchy and its Antithesis”, NASKO. 2(2009), pp.68-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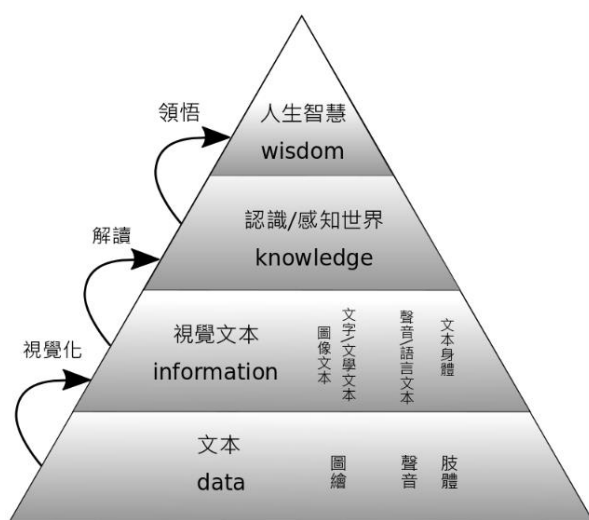


图 2

在知识管理的金字塔模型结构里，认为我们接收/收集的数据/资料必须经过解释、分析和判断，转化成信息/资讯。“转化”的方式，在“文本”到“视觉文本”阶段的“可视化”过程，有些是文化习惯、社会规范的结果，比如握手、合掌都是为了致意，表现方式不同。在解读视觉文本时，不能全靠“生而知之”、“天生而能”，靠的是教育/教养。这时，便可以实行“做中学”，从体验与人握手、对人合掌，反思察觉个中感受。简言之，“做中学”是文图学理念里重要的行动原则。

我在新加坡教文图学时，便实践“做中学”，由于不清楚美国学生的知识储备情况，更认为“做中学”可以减少学生为掌握理论概念的负担。以下举三个例子。

五、示例一：汉字的原则

汉字做为具有图象和意涵的视觉文本，是如何创造出来的？许慎《说文解字》里谈的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即使有英语翻译，解释这六书的内容，还是很难体会。所以，我设计了作业：

- 1.发明设计一个汉字。
- 2.为这个汉字定义发音和指涉。
- 3.用这个汉字造词和造句。

下一周轮流把自己发明的汉字写在课室白板，介绍给同学们。

以下是其中部分同学的造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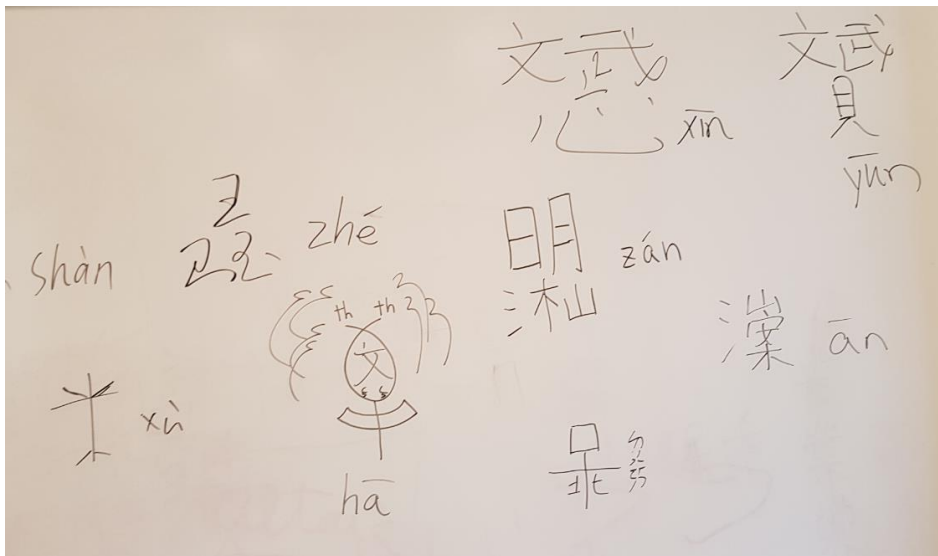


图 3

听过各自发表以后，我们讨论，大致包括：

1. “hā”那个字不像“汉字”——汉字的笔画为什么少弯曲？为什么明明看起来是图象，却不能是漫画/图案式的图象？

2. 有两位同学都用了“文+武”组合，下配另一个字——为什么不会把“文+武”放在字的下方？相反地，“zhē”那个字，“王+王+玉”，为什么单一个“王”字放在上面？

3. 没有一位同学造的字发音为第三声。汉语连续两个第三声出现时，为什么前一个三声要转成二声？

经过连番讨论，我们回到《说文解字》，以及学者统计指出：常用汉字 40% 左右是形声字，明白了为何人们常说：看到不认得的字，“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有比较大的概率猜对！

接着，我谈仓颉和武则天的造字，同学们马上明白了个中的神化和权力。然后谈为回避网络审查而采取的当代造字，同学们热烈发言。最后分析徐冰的有字天书——用英语排列组合成像汉字的图样。

六、示例二：图卷的“互文性”与“互媒性”

文图学课程内容从汉字到书法、绘画、题画诗、诗意图、漫画、绘本，最后谈互联网。学生大部分是研究生，一位本科生。研究生的本科背景很多元，有中文/东亚系；也有数学系、语言学系、艺术史系。即使是中文/东亚系毕业，专攻现当代文学，直接进入讨论的环节前，仍需一定的知识涵量。“做中学”的方式，继续发挥作用。

拿以陶渊明〈桃花源记〉的文本绘制图画的《桃花源图》为例，我介绍了中国传统绘画的基本形式和装裱，牵涉“青绿山水”、“摹本”、“异时同图”、“叙事画”，以及如何欣赏图卷的问题，与其“纸上谈兵”，不如动手操练。

我彩色打印了波士顿美术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两卷构图近似的《桃花源图》，各裁剪成14个段落，将学生分为两组，进行图像接龙竞赛，获胜组得到日本抹茶蛋糕。同学们都很起劲！同心协力拼凑黏贴出整幅画作，在判断图像段落的前后顺序时，自然复习了陶渊明的文章，并且发现文章里的“武陵人”在画中多次现身，明白这就是“异时同图”的意思。

完成接龙，大家开心分享蛋糕。休息过后，再回到两件作品，比较得知“摹本”的情况，交换看对方组拼接的图，分析两件作品的异同。由于上一节课在竞赛时，已经注意到画家的创作构思和原文的关系，此时再针对“文本”和“图像”的关系，发现文本和图像有增删的细节，进而思考为何如此处理？于是从“互文性”谈到“互媒性”（intermediality, 跨媒体性），直观理论的精髓。

七、示例三：下真迹一等

斯坦福大学有不少依学科分类的图书馆，每间图书馆都有宛如咖啡馆或旅店大厅的舒适座位。我的办公室就在东亚图书馆里，十分便利。美国许多大学都有东亚图书馆，但不晓得和斯坦福一样有“艺术与建筑图书馆”的多不多。我教的文图学课，需要大量的图像资料，艺术与建筑图书馆不但藏量丰富，还有精致的原尺寸书画复制品。

讲到苏轼《寒食帖》，我展示我带去的原寸复制件，大家对印章特别感兴趣，西方收藏家可不会在自己的藏品上添加东西，为什么中国不担心“破坏”

藏品呢？有了学生的主动提问，我解释古代中国的收藏观念和歷史。接着讨论钤印和题跋对书画的意义，反问同学们：“所以，如果你有一件传世珍宝，你要不要注记你的“拥有权”呢？大家议论纷纷，很惊讶从这样自由的交流过程中，认识了自我的价值观，以及对于“物质”、对于“欲望”的想法。

我申请借閱观覽日本二玄社制作的北宋范宽《溪山行旅图》和金代武元直的《赤壁图》，在艺术与建筑图书馆的研究会议室上课。近看作品的细部，什么是皴法、飞白；怎样辨识钤印和书体，连那个隐匿在芭蕉叶隙的范宽签名都一目了然。学生用中文齐声逐字读出《赤壁图》后面赵秉文的题词，一旁的图书馆员 Peter 不禁鼓掌叫好！他说：“虽然听不懂，能感觉像诗，有节奏韵律，太美妙了！”

Peter 的一番话，兴起了同学们的自豪感。这时学期已经近尾声，我提醒同学们学以致用，把掌握到的观看方式，到校内的几个美术馆练习欣赏艺术品。无论是东方或是西方；平面艺术或是立体装置艺术，在没有专人导览解说的普通时段，用自己的眼睛去沈浸和审美。

八、结语

本文举了三个实例，分享我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文图学的经验。能够成功地经由“做中学”达到学习的效果，归功于该校自由开放的校风，弹性的课程制度，以及丰富的教学资源。这些外在的条件之余，最核心的，是同学们乐于“为用而学”，信任我的教育理念，配合我的课程设计，按部就班，共同实现理想。

“做中学”并不是唯一最好的教学方式，要考虑课程类型和主旨。以文图学而言，当下大量的文本和图像材料公开于网络，可任人浏览和下载，教师顺势鼓励学生们善加利用，便自然而然“做中学”了。读者诸君如果对我的教案有兴趣多加了解，欢迎参看拙著《春光秋波：看见文图学》(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书中有更多演练的规画。

【征引文献】

一、中文论著

衣若芬,《春光秋波:看见文图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

衣若芬,《南洋风华:艺文·广告·跨界新加坡》,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16。

衣若芬主编,《东张西望:文图学与亚洲视界》,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19。

尚恩·霍尔(Sean Hall)著、吕奕欣译,《这就是符号学!探索日常用品、图像、文本,76个人人都能读懂的符号学概念》,台北:积木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15。

二、期刊论文

衣若芬,〈文图学:学术升级新视界〉,《当代文坛》2018年第4期,页118-124。

三、报章

衣若芬,〈胡佛塔上〉,新加坡《联合早报》,2018年6月2日。

四、英文文献

Jay H. Bernstein, "The Data-Information-Knowledge-Wisdom Hierarchy and its Antithesis ", NASKO. 2(2009), pp.68-75.